



悲哀的童话：鲁迅的儿童文学实践

文 | 周勇

近些年,为“进一步推进课程改革”,发展“理解和尊重学生的教育”,不少课程及教育专家都在提倡“儿童学”。新近颁布的《教师教育课程标准》也把“儿童学”列为教师必须掌握的新“教育专业知识”。虽然目前还无法看清楚,为了让学

生获得“理解”“尊重”乃至“快乐”,提倡者将会以什么样的“儿童学”训练教师,但当前的提倡与政策推动倒是很容易让人想起清末以来教育界兴起的诸多时断时续或不了了之的“儿童学”运动。

那时面临的一大难题也是如何理解作为教育对象的“儿童”。为了攻克这一教育革新难题,康有为、梁启超等清末教育改革领袖曾采用“生理学”“社会学”“政治哲学”等现代知识工具来透视“儿童”的“特性”与“潜能”。至“新文化运动”期间,教育界又兴起“文学”化的“新儿童学”运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夏丏尊、丰子恺等“新教育家”在江浙一带发起的“儿童文艺”实验。与心思杂多的康有为、梁启超相比,他们堪称真正的儿童教育家,并依靠文学创造了以“天真的童趣”为本的“新儿童学”。

然而本文并不打算揭示夏丏尊一系的“新儿童学”,而是要将视野转向鲁迅,考察鲁迅拿出了什么样的“儿童学”。相比在地方活动的夏丏尊等,鲁迅则是全国“新文化运动”的旗帜人物。但本文所以特别留意鲁迅,绝非因为他位置更高,名声更大,而是因为从不盲从任何潮流的他贡献了一种视角及意义皆十分独到的“新儿童学”,能为今天的“儿童学”提倡者提供一份异样参考。

救救孩子：沉痛的“呐喊”与儿童关怀

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新文化”领袖盯着各种远离民国社会现实的对象不同,在《狂人日记》中,鲁迅则将新文学视野与关怀扭向了在民国社会现实中苦苦挣扎的“活人”。

1912年民国成立之际,鲁迅便被蔡元培提到教育部任职,负责推广美术、博物馆等事业。不过,许多事都是不了了之。蔡元培也只干了不到一年,便辞去首任教育总长一职。到1917年,“新文化运动”试图在全国打开局面时,身受“处级”体制待遇的鲁迅白天仍在教育部“混薪水”,晚上也是照



1930年的鲁迅

旧回到住处“抄古书”。

对于1917年陈独秀、胡适和同门钱玄同、沈兼士(皆为章太炎弟子)等北大教授正在酝酿的各种“新文化”运动,从传播西方“科学”与“民主”,到搜集本土民间歌谣,鲁迅都十分清楚。昔日基层同事老友夏丏尊、丰子恺在干什么,鲁迅同样不乏了解渠道。然而鲁迅什么运动也不参与,只是“抄古书”,可谓沉默至极。兼做《新青年》编辑的钱玄同看了急死,逼问他“抄这些有什么意思”,得到的答复是“没什么意思”。

钱玄同着急来找,是因为《新青年》提倡的“白话文学革

命”总难扩大声势,心想把鲁迅拉进来做文章,或能打开局面。钱氏三番五次前来催促,让鲁迅无法拒绝。但写什么,为谁而写呢?

像胡适那样考证中国文学史,固然可以示范西方人文“科学”方法,同时将古代白话小说挖掘出来,但终究缺乏现实力量,仍是些与“活人”关系不大的“死东西”。至于像钱玄同那样,写文章大骂迷恋“古文”的无辜老先生林纾,或极力主张“废除汉字”,改用“世界语”,则是“激进”到不着边际。再看被军阀势力支配的政界和失去方向、混乱污浊的社会,更是觉得“没有话说”。总之,对鲁迅而言,走出多年以来的沉默,是一件极费思量的事,以至钱玄同催了多次,也见不到文章影子。

几个月后,鲁迅决定“呐喊”,并于1918年5月在《新青年》发表了《狂人日记》。形态上,《狂人日记》只是一短篇小说,却也足以让总难打开局面的“白话文学运动”转向崭新生路。从此“新青年”们无需将青春浪费在大骂无辜的林纾或孔子上,也不必非得像胡适那样在历史中寻找死去的白话文学,而大可以通过创作揭露“礼教”制度“吃人”本质的白话小说,表达自己的真切生活体验与心灵诉求。二十年代起,大批男女俊秀学子转向以“新文艺”为业,让胡适的“整理国故”黯然失色,鲁迅功不可没。

事实上,仅说为“新青年”开拓了白话文艺新路,还不足以显示鲁迅作品的非凡意义。对本文来说,更值得关注的是,与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新文化”领袖盯着各种远离民国社会现实的对象不同,在《狂人日记》中,鲁迅则将新文学视野与关怀扭向了在民国社会现实中苦苦挣扎的“活人”。不仅如此,鲁迅所关注的还是民国社会最弱势的人群,尤其是无辜承受各种历史暴力的“儿童”与“妇女”。

相比于批判“封建礼教”,“救救孩子”才是鲁迅的“呐喊”宗旨,也是他在“新文化运动”的喧嚣中独辟蹊径确立的新文艺使命。无疑,这是一声沉痛且略带绝望的呐喊,连“孩子们”都被历史暴力吞噬,难有自由与新生,彼时“国家”还有何希望。但只要“呐喊”不绝,终归有前途,所以即便鲁迅后来也曾编撰《中国小说史》(部分因为大学学术课程制度的限制),但其文学重心始终是发展“直面惨淡的现实”的小说、杂文与绘画等。以下便来探讨他的儿童文学实践及“儿童学”表达。

悲哀的童话:让儿童学会直面残酷现实

鲁迅走进了现实中的任何儿童群体,更无意发明所谓能阐明“儿童本性”的“儿童学”,但他选择发展“悲哀的童

话”,却可以让所有儿童在追求美好之前,首先学会直面残酷乃至让人绝望的现实。

早在日本留学时,鲁迅便对歌谣、神话等民间文化产生浓厚兴趣。进入教育部工作后还曾提议成立“国民文术研究会”,负责整理“各地歌谣、礼谚、传说、童话等”,“以辅翼教育”。但早年这些活动的关注点是普遍的“国民性”,认为通过研究民间文化,可以认识、改造“国民性”,其“国民”视野还未指向现实中的特定人群。从《狂人日记》起,鲁迅调整了自己的“国民”视野,将其具体化为被暴力摧残的“孩子”,从而开启了其旨在拯救“孩子”的儿童文学实践历程。

当然,除了“儿童”或“妇女”外,鲁迅的文学实践后来还有其他具体的关切对象,如阿Q、孔乙己,都是在暴力现实中挣扎的可怜“活人”。只是本文仅考察鲁迅的儿童文学实践。首要问题显然是鲁迅将如何“走进儿童”。他学过生理学,也熟悉当时流行的哲学、心理学,但提出“救救孩子”后,他并没有依赖这些一般的“儿童学”工具,他器重的工具是儿童文学。

1919年,鲁迅加入《新青年》编辑部,不久便看见胡适转而大力提倡“整理国故”。对于鲁迅横空出世的“呐喊”及白话文学功夫,胡适一系虽然表示赞赏,但私下以为不是“学术”,因此不会去创作儿童文学。鲁迅也不会把胡适引为同志。熟悉的人当中,还是时在春晖中学任教的夏丏尊、丰子恺等老友与他选择相似,且正在酝酿翻译意大利儿童文学名著《爱的教育》。

夏丏尊等人认为,《爱的教育》可以为发展中国儿童文学提供满意范本。《爱的教育》是很好,彼时中国“儿童”也确实需要“爱”。然而鲁迅也未加入老友队伍,去发展真善美的儿童文学。就像20年代初,京城各路改革精英纷纷以“教育平等”“婚姻自主”“恋爱自由”“职业平等”等美好理想,来鼓励本国女子向“娜拉”学习时,鲁迅却独自提出泼冷水的问题——“娜拉走后怎么办”(提醒女子先解决“经济基础”最重要),当他思考如何“救救孩子”时,同样对老友们认可的真善美儿童文学表示怀疑。

在鲁迅看来,将“儿童”引入真善美的儿童文学世界,固然非常值得尝试,但更负责的思路乃是让“儿童”直面自己生活在什么样的现实世界里,哪怕现实令人悲哀,也不能回避它,如此才可能学会在残酷的民国社会现实中,勇敢独立地追求美好。不然,任何美好的理想最终都会被残酷现实击破。总之,与夏丏尊、丰子恺不同,鲁迅所要发展的是“悲哀的童话”,以此让“儿童”学会直面残酷现实。



发展“悲哀的童话”或许也是鲁迅唯一能做好的“儿童学”。以他的处境与状态,似乎现实中任何类型的儿童都难以接近,更妄谈可以深入了解某类儿童(夏丏尊们还可以接近中小學生),但他非常清楚所有的儿童正生活在什么样的社会现实中,因此可以这么说,鲁迅走进不了现实中的任何儿童群体,更无意发明所谓能阐明“儿童本性”的“儿童学”,但他选择发展“悲哀的童话”,却可以让所有儿童在追求美好之前,首先学会直面残酷乃至让人绝望的现实。总之,“悲哀的童话”即是鲁迅贡献的独特“儿童学”范式。

发现爱罗先珂:鲁迅式“儿童学”的文学表达

鲁迅特意将爱罗先珂的悲剧童话作为自己最满意的童话文本,首先是因为爱罗先珂的苦难经历能集中体现他试图让“儿童”认识的残酷现实,其次便是爱罗先珂的“赤子之心”可以给“儿童”以希望,无论现实多么绝望,都能坚持追求正义与美好。

夏丏尊、丰子恺等太爱自己心目中的“儿童”,《爱的教育》可谓正合其心意。后来,他们又创作大量的文学、散文与漫画,来表达“儿童”之爱:尽是“天真的童趣”,美好到令丰子恺将“儿童”视为世间“彻底真实而纯洁的人”,并曾为女儿长大,告别“黄金时代”(童年)感到忧伤。那么,鲁迅将以何种文学文本来表达其色调不同的“儿童学”呢?

1921年8月,鲁迅在《新青年》公布了自己满意的儿童文学文本,即他译的俄国流放诗人爱罗先珂的悲剧童话《狭的笼》。1916年,双目失明、旅居日本的爱罗先珂开始创作悲剧童话。不久,又远赴缅甸主持盲人学校。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他被缅甸殖民当局视为布尔什维克奸细,遭到驱逐。1919年,他辗转回到日本,参加左翼文艺活动,这导致他在1921年再次遭到拘留、殴打和驱逐。是鲁迅、胡愈之、茅盾等人援手,使其安全转到中国上海。

在鲁迅看来,爱罗先珂饱尝人间种种暴力与危险,却始终“有一个幼稚的,然而优美的纯洁的心”。鲁迅“深感谢人类中有这样的不失赤子之心的人与著作”。1922年2月,鲁迅在北京寓所如期等到了令他“十分兴奋”的赤子诗人爱罗先珂。这里简单交代《狭的笼》背后的史事,是为了说明,鲁迅一番寻找之后,之所以选择童话文本来表达其“儿童学”,

又特意将爱罗先珂的悲剧童话作为自己最满意的童话文本,首先是因为爱罗先珂的苦难经历能集中体现他试图让“儿童”认识的残酷现实,其次便是爱罗先珂的“赤子之心”可以给“儿童”以希望,无论现实多么绝望,都能坚持追求正义与美好。

周作人、胡愈之、茅盾等也将爱罗先珂视为理想诗人和安徒生、王尔德之后最有才华的童话文学家,并在《新青年》、《晨报》撰文,介绍他的事迹,讨论他的童话。赵景深更是提出,如果将安徒生、王尔德和爱罗先珂放在一起,恰好可以构成完整的“教育童话”,“供给渐长的儿童——从童年到少年壮年”。他们恨不能在一夜之间让爱罗先珂家喻户晓。

沉潜的鲁迅更乐于独自翻译爱罗先珂的反映残酷现实的悲剧童话,同时创作风格相似的童话。译完《狭的笼》,鲁迅又译了《小鸡的悲剧》《池边》《鱼的悲哀》等作品,并推出了自己的童话《鸭的喜剧》。这些童话作品,加上《狭的笼》,都是鲁迅式“儿童学”的典范文学表达。只是由于篇幅有限,无法逐一展开分析。不过其精神,本文早已交代,它们都是以童话方式生动表现了人类的无望现实及希望。

发现爱罗先珂,不仅将鲁迅的儿童文学实践带入高潮,也让他找到了满意的童话文本来表达其“儿童学”。此后,鲁迅的文学重心再次回到成人小说。不过,其使命仍是描绘“铁屋”一般让人绝望的残酷现实,并在其中寻找希望,就像他在译《狭的笼》之前,曾对童话提出这样的要求:“作者所要叫彻人间的是无所不爱、然而不得所爱的悲哀”,虽然如此,但作者仍能保持“童心的美的梦,而且还要招呼人们进入这梦中,看定了真实的虹”。

末尾想起,就当前的“儿童学”进展而言,最前沿的“儿童”研究工具既不是哲学、心理学,也不是文学,而是前所未有的“教育神经科学”。但“儿童学”提倡者似乎更信赖“社会学”“人类学”。旁观者真不知道该如何“走进儿童”。此外还看到,许多不知所从的人都成了“民国怀旧者”,有的正在梳理丰子恺、夏丏尊的儿童文学教育。那么,谁在重温鲁迅的“儿童学”,光大其童话实践呢?这个问题无从回答,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这世上最值得爱的人群依然是“儿童”,因此仍需丰子恺式的“天真的童趣”加以呵护;至于鲁迅式“儿童学”,同样是更基础的现实需要,否则只能将“儿童”引入与世隔绝的美好幻想里,成不了“真的勇士”。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